

神的道理和人的傳播——人神如何共融

丁 偉

兩個現象

宗教導人向善，眾所周知；問題是神的道理，在人世間如何傳播；教會又如何面對「世俗」社會對教會內部事務及教理的挑戰與質疑？

我想許多人都注意到當今世界的兩個看似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在所有發達國家（包括香港），教會似乎已經「邊緣化」，教徒不上聖堂是閒事，響應聖召的年青人寥寥無幾，「司鐸荒」的現象困擾大部份西方國家。筆者復活節期間在澳

洲墨爾本，星期六晚出席復活節夜間的彌撒，五位輔祭當中，竟有三位是老人，其中一位甚至已經九十多歲。當晚彌撒頗長，前半部是漆黑一片，全場教友都手持蠟燭，氣氛蠻好，但九十多歲的輔祭卻跌了一交，真替他捏一把汗。至於神父，也已七十多歲，當晚有一人領受洗禮，老神父先步入浴缸般大小的洗禮池，真怕他滑倒。環顧彌撒會場，觸目皆是老人，還有一些帶著小孩的年青夫婦，青少年（十多歲到卅歲左右）基本沒有。

我曾在法國參與彌撒，情況雷同。看到這些景象，

真使人擔心，天主教會後繼無人矣。

另一方面，宗教對國際政治的影響，近幾十年來已漸次成爲顯學。記得在七十年代末期伊朗伊斯蘭教領袖什葉派的霍梅尼(Khomeini)上台，《經濟學人》週刊某期的封面是一個看似玉婆的人物，文內預測未來世界不得安寧，因爲霍梅尼是仇視西方的戰鬥格領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是兩伊戰爭，之後是美國的兩次波斯灣戰爭。三十多年來，伊朗原教旨主義者興起與中東的動盪，一直是世界的熱點。另一場運動則是美國宗教右翼勢力的崛起，其「好鬥」的特點，已對美國的政治和社會文化產生影響。前陣子美國一個牧師在教堂內焚燒《可蘭經》，象徵美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已上升爲一種「宗教民族主教」，宗教衝突已取代意識形態，主導國際政治發展。美國在八十年代支持屬遜尼派的伊拉克去抗衡什葉派的伊朗，二零零三年卻派兵直搗巴格達，把侯賽因拉下台。宗教恐怖主義與宗教極端勢力已掛勾，成

爲影響多個國家安全的頭痛問題。

至於天主教會，早於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即有解放神學，面對無惡不作的「腐朽沒落」政權，爲彰顯公義，教士也應挺身而出，參與暴力鬥爭。八十年代末東歐巨變，特別是波蘭團結工會運動，論者無不認爲天主教會作爲民族團結的紐帶，莫不起到推動變革的作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強調應無不留情地對不公正不正義的根源大張撻伐，一下子把天主教會轉變成伸張正義並推動社會進步的核心力量。

宗教已成爲「國際關係中跨國群體認同或身份建構的主要方式之一。」(註一)此外，最近五十年來，「軟實力」研究方興未艾，一個國家強大與否，軟實力，即文化、制度、思想、價值觀等之發展不可或缺，而宗教亦公認爲「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份。

宗教教義既涉及人口增長、生命尊嚴、婦女地位等等問題；宗教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在扶貧、

教育、環保及實踐社會公義方面又多所貢獻，但宗教也是構成恐怖主義及民族主義的核心元素。宗教對現今社會之國際政治的影響不言而喻。可是，回到香港，天主教會的事業，似乎不敵世俗社會的歪風。教會當然不能遺世而獨立，但面對現實的各種困境，特別是在「祛邪扶正」方面，如何把神的道理傳播開去，顯然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工作。

香港教會傳道面對的困惑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說過，神愛世人，是愛所有人，不是教徒即愛，非教徒則不愛。如果我們只愛教友，而不愛非教友，則是用人的眼光去演繹神的道理，是不對的。愛人如己的那個人，泛指所有人，而不單是皈依天主的人。但我們很難要求每一個人都有最高至善的理解，畢竟俗世凡人，要掌握神的道理，總要經過一個過程。關鍵的工作就在這裡。洗禮代表了接受主的恩寵，關

但有了信仰，不表示即已完全掌握神的道理。這個培育、悟道、昇華的過程可以非常漫長。教會是介乎人與神之間的中介組織，但它畢竟是由人組成的，儘管我們有很多「神師」。教會的「人」要傳播「神」的道理，他們首先要領悟箇中的精華，神學（及哲學）教育當然必不可少，但他們深切了解這個孕育眾生的複雜、多變、混淆的世界。向受眾傳播道理，不能不對受眾身處的社會有深刻的體會；只有掌握當地文化、思想與主流價值觀，才能切中要害，把神的道理打入受眾的靈魂深處。

因此，如何使「主內兄弟」的傳播，能夠有效無誤地把天主的道理完整地嵌入教友的心靈，是教會的第一要務。這並非是簡單的「講道理」，而是如何把主的教導演化成每個教友的生命智慧。從教友的立場來說，美妙動人的文章，或是振聾發聵的彌撒講道，是啓發心靈從而更接近天主的溝通。講道的技巧固然重要，但提升教友受

眾的精神境界，也是我們對神師的基本要求。

此外我們還有《公教報》。比起數十年前，今天的《公教報》真是生動活潑得多，特別是多了教徒以至神父批判各種社會現象的評論。《公教報》不單是報導教會動態，也是主內兄弟姊妹思想交流的園地。既是思想交流，我看還可以開放一點。「喜樂少年」也辦得很好，最近介紹民國時期教育家蔡元培與吳宓的文章，篇幅不長但要言不繁，很有啟發性和教育意義。

可是，畢竟《公教報》還是「小眾傳播」。

天主的福音與啓示，欠缺大眾傳播媒介的幫忙，根本難以到達「大眾」(mass)的心坎，更不要說打動他們了。Mass 這個字原自十九世紀，當時出現了 mass transport, mass media, 之後又有 mass society, mass culture。以前教會的影響是透過感化一個一個人，由點及面，但自從「大眾」出現之後，教會及其信徒卻貶成「小眾」了，對整個 mass society 的發展，宗教起到的作用似在下降。

大眾傳媒不會替教會傳教，但他們卻樂於報導有關教會的「新聞」，可惜所謂新聞又多是負面的。他們不會報導教會動態，評論版又多是關於政治經濟社會，除非教會有大事發生（例如新選教宗），才會引起他們的關注。

香港的大眾傳媒，暢銷的總是品味低劣，正是天主教會在社會上要抗衡的現象。譁眾取寵是這些傳媒的特性，他們最感興趣的是教會的「醜聞」，又怎能期望他們會為社會培養正確的價值觀？天主教會面對信眾還可望守護自己的陣地，但面對 mass society 的劣質文化與價值，似乎顯得無能為力。如何把非教徒的群眾，從這些鄙俗低劣的價值中解救出來，是教會必須勇於面對的挑戰，也是我們不可推卸的神聖任務。

天主教徒要「兼善天下」，但手法端的有限。最原始的方法是個人接觸，或吸納有興趣的親友加入慕道班。另一種方法是依靠「魅力領袖」，比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或我們的陳日君樞機，無畏

無懼講出群眾心裡面的真話，極大地提升了天主

教會作為道德高地的地位，鞏固了教會的威信。

但魅力領袖並不常有，教會要發揮影響，還是要靠細水長流、水滴石穿的毅力，而完善的架構與機制，絕對是不可或缺。撇開那些已在進行的不說（比如主日學、學校的聖經課等），廣大的天主教徒知識份子或專業人士，能否把他們聚合起來，就某些社會政治議題發聲，發揮道德良心的力量？法國有天主教報章及學術期刊，打正旗號月旦時事，發出天主教的聲音。「搶佔陣地」是影響公眾輿論的必要舉措。

在香港社會傳播神的道理，的確要面對教會本身存在的種種局限，以及客觀社會環境的制肘。但我認為最需要的是開放與包容的精神。天主教會當然義不容辭對社會上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大張撻伐，但對教會內部存在的各種問題也應勇敢面對，畢竟教會是由人組成，必然無法避免因心性醜惡而引致的弊端。

英國著名的御用大律師駱弼臣（Geoffrey Robertson）最近就寫書質疑教廷處理眾多神父變

童事件的手法：究竟是否應該在教會內部解決這些「天主子民」所犯下的罪過？還是把他們看作「人」，交由世俗的法律去處置？另外一本書剖析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如何「參與政治」、影響世界，而不單純是宗教領袖。（註一）不管別人是否善意及開明，教會總得勇敢地反思及回應來自世俗社會的挑戰與質疑。教會代表上帝，但它本身也是由「人」組成的世界；人神「共融」固然好，但若犯了人的罪惡，對神來說就是褻瀆。

註釋：

(一) 參看徐以驛，「宗教與當代國際關係」，《國際問題研究》，2010年第2期，頁46。

(11) David Yallop,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London: Constable & Robinson, 2007, p.740.

□